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左聯史

夏征农



姚辛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联史/姚辛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9

ISBN 7-80206-105-9

I . 左… II . 姚… III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 历史 IV .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3727 号

书名:左联史

著者:姚辛

出版人:朱庆

责任编辑:鲁葳

封面设计:红蚂蚁工作室

版式设计:金色长城

责任校对:祝慧敏 徐为正

责任印制:胡骑 柴自邦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话:010-67078243(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真: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址:<http://www.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印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本:889×1194 1/16

印张:46

字数:1000 千字

版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7-80206-105-9

印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68.00 元

出版人：朱 庆

责任编辑：鲁 茜

封面设计：红蚂蚁工作室

责任校对：祝慧敏 徐为正

ISBN 7-80206-105-9



9 787802 061057 >

定价：168.00元

序一

执拗的过客

王锡荣 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

我认识姚辛先生已近 20 年了，也知道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左联，当然也看到他已经出版的《左联词典》和《左联画史》，觉得以他这样一个文化不高的、非“职业”的研究者而能有如此成就，殊属不易。以至于我周边的“专业”的研究者们好像因此反而放弃了这个课题，而把这块园地交给他一个人去耕耘了。而他倒是心气真高，居然又写出了这样一部更带理论色彩的全史来，说老实话，我是并不感到意外的。

姚辛，是浙江嘉兴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退了休的工人，没有文凭，没有职称，朴实得像一个老农民。而他对学术、对左联史研究的执着，却是执拗到了几乎痴迷的地步。据所知，他收入极低，大约仅够糊口。却自掏腰包，到全国各地去搜集左联史料，大有非一网打尽而不罢休的韧劲。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至今头发都白了，还在跑！弄到几乎倾家荡产，委实令人敬佩——何止敬佩，简直是敬畏！他对左联每一件史料枝枝节节的挖掘和爬梳剔抉，也追根究底，力求详尽，值得我们所有的专业研究者学习。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令人信服的：不止一次发现新资料、纠正误说，常有新突破。所以，他写出一部洋洋大观的《左联史》来，实在是功到自然成。我们的专业研究者面对这位纯业余的研究者真是要汗颜了。

近年来，国内关于“左联”的研究，多少有些沉寂。可是，稍稍搜寻一下，却发现研究者并没有停止对于左联的探索。就在前不久，香港还举行了一次左联研究学术研讨会，而日本的研究者一直在进行相关研究，如小谷一郎撰写的《东京左联再建后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的活动》长篇论文，在中国文艺研究会出版的《中国文艺研究》上连载，至今已经连载到第 13 期。另外，香港的王宏志先生的研究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也写出了专著。而大陆的研究，虽不能令人满意，却也还差强人意。从姚辛的《左联画史》（2000 年）出版以来，几年来，除孔海珠女士的《左翼，上海》（2003 年），还有就是 2004 年人民文学出版的《红色狂飙——

左联实录》(刘小清著)一书，都是直接谈左联事情的。只是前者略嫌散漫，多为史料的挖掘，而后者虽从历时性角度叙述左联史事，但在史的梳理上，还显得欠缺了些，且在史料的挖掘上，也不免有些局限。现在，姚辛先生的这本书，却使我感到眼前一亮：

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大著，无论在史的梳理上，还是在新史料的挖掘上，都显示了著者的功力。

我说这话是基于下面这些翻阅之后所得的粗略印象：

这本书没有按常规从理论的框架出发，而更注重于史的发展演进的线索，并详细罗列出每一本书、每一种期刊、每一个群体甚至每一个个体。初看之下，似乎有罗列之嫌，但却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全部真相。——说实话，我刚开始看这部书稿的时候也习惯性地感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稍感意外。但随着叙述的深入，我反倒感到这样的叙述更加清晰，并没有什么不好。由此我想到：是否我们传统的叙述方法出了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拘泥于所谓的理论框架，满足于、停留于空洞的高头讲章、板板六十四的说教呢？文学史的体例和写法难道不可更灵活，更新颖吗？我的结论是：这样“轻性”的文学史专著或者也能别开生面，也能够得到读者欢迎的吧！

其次，作者并没有像常规的写法那样，局限于论述主体的内部，而是大胆突破了左联的组织建制，把眼光扩展到左联的外部，通过对外部情况的缕述，让我们看到更多左联的相关史实。例如，他没有限于左联成员的活动，而是把左联以外，甚至对立面的情况也加以缕述，这突破了以往单向的叙述视角，大大扩展了读者的视野，了解的情况就更全面。

第三，书中搜集的反面材料也非常丰富，这也是值得推广的。鲁迅主张研究对立面，他曾批评当时的评论家谙于同一阵营而疏于外围，而对对立面就没有多少话可说了。鲁迅认为这种偏向是应当力求戒除的。我觉得姚辛这部书是在注意克服这一常见病的。

从这部书，我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在《左联词典》和《左联画史》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史料的左联”，而在这部书稿中，我们依稀看到了一个“全貌的左联”。而从作者的角度说：前者让我们看到“史料家的姚辛”，而这部书却让我们看到一个“史家的姚辛”。公平地说，此书在姚辛本人的研究道路上，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新突破。

此刻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人——鲁迅笔下的“过客”。我觉得姚辛的执着真有几分像那个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精疲力竭的行路者，虽然显得不合时宜，却义无反顾，一往无前，他也并不唱高调，却是只顾前行，探索，只在有所发现，有所进展时，才一露欣慰的憨笑，然后抹一抹汗，继续前行。姚辛，就是这样一个执拗的过客。

2006年5月1日于上海鲁迅纪念馆

序二

锲而不舍的耕耘

中国左联纪念馆

欣闻姚辛的《左联史》即将问世，我们全馆同志都感到非常高兴。1990年3月我馆成立不久，他就应邀来做资料工作。在多年朝夕相处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

姚辛幼年在重庆保育院里，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开始崇拜鲁迅、瞿秋白、高尔基，并且喜爱阅读他们的作品；参军后，在部队当文化教员，工作之余常去图书馆、旧书摊搜集30年代左翼书刊；复员后，回嘉兴当中学教师，课余时间他全身心地投入现代文学研究。195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英勇就义20周年，姚辛在《杭州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纪念文章《瞿秋白是怎样理解高尔基的》；第二年，全国各地纷纷举行了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他又写了多篇纪念文章。从那时起，姚辛想到鲁迅、瞿秋白都是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领袖，他们率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支生力军，英勇反击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战功赫赫、威振四海。他决定要扩大研究范围，利用暑期进京拜访健在的“左联”盟员，广泛收集“左联”史料，从事系统的学习、研究。不料，在“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准右派”，下放到工厂当临时工。“文革”中，他又受到冲击遭遇坎坷，“左联”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了整整20年。1979年特别是80年代，姚辛终于有机会去全国各地拜访健在的“左联”盟员，进行调查访问工作。十几年间，他先后去过北京、上海等几十座城市，拜访了90多位“左联”作家及一般盟员，还访问了已故“左联”作家及一般盟员的亲属40余人，以及杜宣、蔡若虹等30年代的作家和画家，获得了许多重要史料。

姚辛每到一处，除拜访“左联”盟员及相关人士之外，还去当地的档案馆、纪念馆、党史办、政协文史办、文联、作协、地方志办等部门查阅档案、访问有关人员，对所得的历史资料反复思考、认真分析，实事求是，绝不偏听偏信。以此基础上，他写了288位30年代

“左联”作家和一般盟员的小传（词条），构成《左联词典》一书的重点内容，填补了现代文学史的空白。1994年《左联词典》出版后，许多作家、现代文学研究者、党史研究者、大学教授等纷纷给姚辛写信，对此书给予好评。上海《书城》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姚辛在收集“左联”史料时，不大愿意要“第二手资料”，“他需要的是更权威的‘第一手’资料”，“他冒着严寒，翻山越岭，去洞庭湖北岸的安乡县查清了所谓‘湖南左联’及‘湖南左联负责人曾白原’的来龙去脉和事实真相就是一个例证。”

姚辛一步一个脚印地探索，一点一滴地积累，1999年又出版了《左联画史》，以一系列珍贵的图片，向世人展现了30年代左翼文学的辉煌历史。“左联”老作家夏征农在序言中说：“姚辛同志是一位研究‘左联’历史的专家。他从事这项研究工作近20年，为了搜集资料，校订真伪，他竭尽全部精力，不分寒暑，不怕困难，奔走于全国各省市的图书馆、档案馆以及有关人士之间。这种埋头苦干、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埋头苦干、锲而不舍”确实是姚辛性格的一大特征，《左联词典》、《左联画史》，相继出版是一个证明，现在这部《左联史》的完成，又是一个明证。几十年来，他历经坎坷、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今天终于又结出了累累硕果。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20世纪30年代诞生，已历经了76个春秋。然而，“左联”研究至今还有许多空白，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有志之士来努力填补。相信，姚辛的这部《左联史》出版后，能为众多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提供更多、更详实的史料。

2006年5月于上海中国左联纪念馆

前　　言

有人说：“一个俄罗斯人酗酒，两个俄罗斯人打架，三个俄罗斯人组建共产主义小组；一个英国人是绅士，两个英国人要打赌，三个英国人就是议会；一个法国人是情人，两个法国人要决斗，三个法国人要革命；一个犹太人是伙计，两个犹太人要国际象棋赛，三个犹太人是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那么中国人呢，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北平乃至日本东京，一个中国人会思考，两个中国人会密议，三个中国人就会结社团、办杂志、呐喊、抗议！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碰在一起就结成新一轮的“创造社”，出版新一轮的《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鲁迅、冯雪峰、柔石碰在一起就出版《朝花》周刊和《萌芽月刊》；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碰在一起就组织“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碰在一起就组织“我们社”，出版《我们月刊》。他们虽然各行其事，但投枪，戈矛总是掷向阶级敌人，虽然有时也迷失方向、误伤友人……在大敌当前，腥风血雨的年代，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绝不会隐忍沉默，置身事外！他们明知恐怖浓烈，黑暗强大，但仍要与之搏斗，即使失败，也在所不计，即使倒下，也绝不后悔！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革命作家！他们是时代的良心、时代的旗帜、时代的英雄！正是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之初，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猖獗一时的上海滩，组建了一支叱咤风云的文坛战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局面，铸就了我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学史的巍巍丰碑！

革命有时会形式错误而内容正确，左联成立之初盟员的投身政治斗争就是如此。当反动派企图把革命人民斩尽杀绝的严峻时刻，左联盟员们义愤填膺地走向街头，代表人民呐喊、抗议，代表人民声讨嗜血的恶魔，他们的无畏行动震慑蒋家王朝。他们在努力把“无声的中国”变为“有声的中国”。他们昭示了人生的真价值，文学的真价值。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只知勇往直前，从不畏首畏尾，也不怕后人会笑话他们“幼稚”、“极左”，他们一心向往的是争求民族的翻身解放，人民的自由光明。他们决不愿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斋文人。他们是行动者、战斗者，后人应当理解他们。那种把左联说成是“极左思潮产物”的论调是浅薄的。

左联在“四·一二”大屠杀后的白色恐怖中诞生，在残酷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坚持斗争长达6年之久；它的队伍，从最初一支四、五十人的小分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旌旗蔽空的大军；它创造的文学成果前所未有、丰富异常，而所有这一切，也与众多中外友人的真诚相助、全力支持分不开。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以及蔡元培、柳亚子、杨铨、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章乃器、史良、胡愈之等社会名流，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卖国投降，从政治上支持左联和左翼文学运动；学术界文艺界的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曹靖华、巴金、夏丏尊、李一氓、王统照、范文澜、吴承仕、朱自清、艾思奇、唐弢、李何林、靳以、杜宣；新闻出版界的邹韬奋、杜重远、黎烈文、曹聚仁、赵家璧、黄源、萧乾、傅东华、赵景深、金仲华、徐调孚、章锡琛、吴朗西、马国亮、张梓生、孟十还、谢六逸、钱歌川、楼炜春、李小峰、费慎祥、杨晋豪、沈兹九、蔡慕晖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的宣侠父等，都从各方面支持帮助左联，为左翼文学运动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林语堂、施蛰存、沈从文、朱曼华等，与左联和左翼文学运动存在距离或是分歧，但许多时候还是认真帮助左联及左翼文学运动的。同左联站在一条战线上，积极投入左翼文学运动的青年作家、

诗人、剧作家、音乐家则有徐梵澄、蒋牧良、陈白尘、芦焚、萧红、萧军、艾青、臧克家、张庚、吕骥、姚克、施冈、李兰等；大力声援受压迫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外国友人有美国的史沫特莱、斯诺和尼姆·威尔士^①、伊罗生和《草鞋脚》一书的翻译家姚白森^②、乔治·肯尼迪^③、杨启琛^④，日本的内山完造、秋田雨雀、山上正义、尾崎秀实、增田涉、鹿地亘等，凡是关心支持帮助过左联和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中外友人，中国人民都永远记着他们！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其他还有社联（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剧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美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乐联^⑤（中国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语联（中国左翼世界语工作者联盟）、教联（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影联（中国左翼电影工作者联盟）等，这八个左翼文化团体，文学史家称为“八大联”，左联与它们关系密切：人员相互流动，如田汉既是左联常委，又是剧联实际领导人；朱镜我、杜国庠（林伯修）、王学文等既是左联成员，又参加社联工作；各联领导及其他成员也有许多左联的朋友，时常往来，相互交流，相互参加彼此的活动；在上级领导下，左联有时还跟兄弟联盟（例如剧联）开展工作竞赛，树立了革命队伍中团结互助的榜样。社联、剧联都有北平分盟，它们跟北方左联也关系密切，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斗争。北平左联、剧联和上海中国左联、剧联有组织关系，人员互相调动，如于伶就从北平左联调到上海从事左联、剧联工作，北平左联陆万美等也曾到上海向中国左联汇报情况。

文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是上述左翼文化团体的直接领导，1930年7月在上海成立，第一任领导人是李一氓（没有具体职称），沈端先、周扬也负责过文总的工作。机关刊是《文化月报》，仅出一期即遭查禁。

文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是文总的上级领导，是上述所有左翼文化团体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

左联和左翼文学运动对塞北边地（昔之绥远省归绥附近，今之内蒙古西部地区）和云南的文艺界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30年代，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新闻出版界进步力量强大，它们大力出版左翼文学书刊，发表左联作家的著译，为发展壮大左翼文学运动，粉碎法西斯文化围剿，立下汗马功劳。

以上内容，因限于篇幅，只得删去，甚为遗憾。

作为一名文学后辈，多年来我一直期盼能读到一部客观翔实的《左联史》，然而总令我失望；于是我决定自己动手写作。为作准备，我从80年代初，去各地调查访问，查阅资料，先后拜访了90多位当时还健在的左联成员和一批已故盟员的家属子女，还有几位同时代人。在此基础上，先后编成《左联词典》、《左联画史》两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分别于1994年和1999年出版。两书责编鲁葳支持我写《左联史》的计划，并时时给我鞭策鼓励。后因去上海左联纪念馆协助建新馆做资料工作，写作中断年余，直到现在才得以完成全稿。在此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过我的长辈、领导和朋友们。

姚辛

2006年5月

^① 尼姆·威尔士，即海伦·福斯特·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协助斯诺翻译《活的中国》一书。

^② 姚白森，即维奥拉·罗宾逊（Viola Robinson），伊罗生的妻子。

^③ 乔治·肯尼迪（George A·Kennedy），曾将丁玲《某夜》、胡也频《同居》、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茅盾《喜剧》、丁九（应修人）《金宝塔银宝塔》、殷夫《血字》等左联作家的作品译成英文，刊登在《中国论坛》上。

^④ 杨启琛，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家，曾将左联作家适夷的《盐场》和《死》、征农《禾场上》、东平《通讯员》、何谷天《雪地》等小说译成英文，收入《草鞋脚》一书，她还参加了这本英译中国现代小说集的最后定稿工作。

^⑤ 据史料，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下设音乐小组，但北平却有单独的“乐联”组织，昆明的王丹东、王浩兰就是当年北平乐联的成员。

目 录

第一章 在白色恐怖中集结	(1)
第一节 鲁迅周围的人们	(1)
第二节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	(2)
第三节 太阳社及其他	(3)
第四节 繁荣的出版界	(3)
第五节 左联的筹备	(5)
第二章 在红色巨潮中诞生	(6)
第一节 左联成立	(6)
一、左联成立大会	(6)
二、左联的领导机构	(7)
三、常委会下属部门	(8)
四、左联各研究会	(8)
五、左联的区委与小组	(9)
第二节 若干史实辨正	(9)
一、潘漠华出席过左联成立大会吗？	(9)
二、左联成立新史料：冯润璋如是说	(10)
三、左联盟员知多少	(11)
四、郁达夫怎样离开左联	(12)
五、潘梓年领导过左联吗？	(12)
第三节 左联初创期的重要活动与事件	(13)
一、活跃的秘密办公处	(13)
二、召开第一次盟员大会	(13)
三、纪念“五一”	(14)
四、反对查封艺术剧社	(14)
五、揭穿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	(15)
六、茅盾、胡也频和丁玲加入左联	(15)
七、中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左联第二次、第三次盟员大会	(16)
八、声援中华艺术大学自动启封的斗争	(18)
九、潘汉年、冯乃超论左联	(18)

十、发表《左联八一宣言》	(20)
十一、左联执委会决议	(20)
十二、鲁迅五十寿辰纪念会	(20)
十三、左联第四次盟员大会	(22)
十四、举办“文艺暑期补习班”和“现代学艺研究所”	(23)
第四节 左联的舆论机关	(23)
一、左联初创期的机关刊	(24)
二、其他左翼刊物	(26)
第五节 与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	(28)
一、“民族主义文学”派的出笼	(28)
二、左联作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斗争	(28)
第六节 蓬勃发展的左联组织	(30)
一、战斗在北方大地	(31)
二、战斗在日本东京	(56)
三、其他各地左联	(61)
第七节 三处左联辨析	(62)
一、“湖南左联”：一段怪闻	(62)
二、“湘鄂左翼作家联盟”在哪里？	(66)
三、有没有“武汉左联”？	(67)
第八节 左联的对外联系	(69)
一、左联文化大使萧三	(69)
二、左联与欧美、日本的联系	(75)
第九节 左联初创期的文学	(75)
一、鲁迅等盟员作家的文学活动	(75)
二、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的作品	(77)
三、其他左翼作家作品	(79)
第三章 在残酷围剿中壮大	(83)
第一节 镇压	(84)
一、取缔左联	(84)
二、查禁左翼书刊	(86)
三、左联五作家被害前后	(89)
四、冯雪峰接任左联党团书记	(97)
五、沉痛悼念左联五烈士	(106)
六、来自世界各国的抗议	(109)
七、谁是告密者？	(116)
第二节 “九·一八”、“一·二八”前后的左联（一）	(117)
一、瞿秋白参与左联领导	(118)

二、左联文告	(122)
三、其他活动	(124)
四、另外几件事	(126)
五、左联出版新的机关刊	(128)
六、《文化月报》及其他	(139)
七、中国诗歌会的诞生	(141)
第三节 “九·一八”、“一·二八”前后的左联（二）	(144)
一、文艺大众化的倡导	(145)
二、文艺大众化的实践	(150)
三、“九·一八”、“一·二八”时期的抗日文学	(155)
第四节 在新形势下	(165)
一、批判“自由人”及“第三种人”	(165)
二、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及其他	(171)
三、欢迎两位外国作家	(178)
四、文坛事件（一）	(181)
第五节 文化围剿再升级	(186)
一、围剿左联与鲁迅	(186)
二、查禁左翼文学作品	(199)
三、查禁左翼期刊	(217)
四、“丁、潘事件”	(220)
五、再次屠杀英才	(231)
六、受难者	(231)
第六节 1934—1935年间的左联	(251)
一、“新生活运动”及其他	(251)
二、继续努力“文艺大众化”	(257)
三、文坛事件（二）	(271)
四、文坛事件（三）	(292)
第七节 抗日救亡高潮中的左翼文学	(318)
一、纪念日与文学	(318)
二、抗日救亡题材的作品	(322)
第八节 左翼电影的新天地	(352)
一、1932—1933：左翼影坛风雷激	(352)
二、1934—1937：左翼影坛春满园	(373)
三、左翼电影理论的新探索	(401)
四、左联影评人的其他作品	(406)
五、左联影评人的其他活动	(409)
六、国民党残害左翼电影	(410)
七、国民党电影的没落	(415)

第九节 盟员们	(415)
一、领导人	(415)
二、领导层	(420)
三、英烈们	(437)
四、盟员	(443)
五、另类盟员	(547)
六、附记	(550)
第十节 左联解散前后	(550)
一、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	(550)
二、“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	(557)
三、新口号的提出和两个口号论争	(558)
四、鲁迅的万言长文及其他	(572)
五、几位左联盟员评两个口号	(579)
六、左联盟友评两个口号	(580)
七、《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581)
八、莫文华（刘少奇）评“两个口号”论争	(582)
第十一节 鲁迅的最后一年	(583)
一、文学纪事	(583)
二、其他活动	(586)
三、不幸病逝	(591)
第十二节 鲁迅逝世前后文坛几件事	(602)
一、部分左联作家的活动	(603)
二、所谓“反‘差不多’”运动	(610)
三、文化围剿在继续	(612)
第四章 在艰难险阻中创造	(614)
第一节 大放异彩的战斗杂文	(614)
一、鲁迅、瞿秋白、茅盾的战斗杂文	(614)
二、其他左联作家的杂文	(615)
第二节 繁华似锦的小说散文	(618)
一、左联的名家名作	(618)
二、其他左联作家的长篇小说	(623)
三、其他左联作家的小说散文	(624)
四、“东北作家群”的小说散文	(628)
第三节 美中不足的诗歌戏剧	(629)
一、一支诗坛劲旅	(629)
二、左联诗作选萃	(629)
三、左联诗论点滴	(642)

四、左联诗歌丛书	(645)
五、左联的戏剧	(645)
第四节 争相涌现的文艺理论	(653)
一、左联作家对马列经典文论的翻译研究	(653)
二、反帝文论的勃兴	(657)
三、左联作家的学术研究（一）	(658)
四、左联作家的学术研究（二）	(660)
五、左联作家的学术研究（三）	(661)
第五节 欣欣向荣的文学翻译	(663)
一、给“起义奴隶”偷运“军火”	(663)
二、可贵的“中俄文字之交”（一）	(670)
三、可贵的“中俄文字之交”（二）	(685)
四、可贵的“中俄文字之交”（三）	(689)
五、可贵的“中俄文字之交”（四）	(690)
六、文学史的翻译介绍及其他	(691)
七、世界弱小民族文学之翻译介绍	(692)
八、左联作家的日本文学翻译	(693)
九、左联作家翻译的德、法、美、英等国作品	(696)
十、左联作家翻译的其他各国小说散文	(699)
十一、左联作家与翻译批评及翻译论争	(700)
十二、优秀的文学翻译月刊——《译文》	(702)
第六节 儿童文学及其他	(705)
一、左联的儿童文学	(705)
二、左联与音乐、美术	(706)
三、“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的左翼文艺界	(710)
尾声：左联光辉永存	(713)
后记	(720)

第一章 在白色恐怖中集结

1927年4月12日，新军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尸横满街，血流遍地，血和雨水汇流成河！”^①4月15日，广州也发生反革命事变，萧楚女等共产党人和工人、进步青年两千余人被杀；5月21日，反动军阀何键、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叛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②在江西，军阀朱培德也开始反共，方志敏等164名共产党员干部被驱除出境，各县土豪劣绅群起捣毁农工团体，残杀革命干部，……白色恐怖笼罩华夏大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4月18日，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

在刀光剑影中，左翼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集结到这华洋杂处的上海滩，仿佛从战场上撤退的士兵。

“四·一二”政变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鲁迅、茅盾、郭沫若分别从广州、庐山和潮汕地区来到上海，钱杏邨、沈端先、冯雪峰、华汉、李伟森、柔石、林伯修、洪灵菲、冯铿、许峨、戴平万、白薇、杨骚、胡也频、丁玲、周起应、周立波、王任叔、适夷、方之中……等一大批革命作家、文学青年从各地汇聚到上海来了；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等从日本回来；他们凭借租界的有利环境找到了隐身之处，而且有了用笔战斗和为同胞服务的岗位。

殷夫和徐懋庸也到上海来了。他们分别考进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一年级和劳动大学中学部读书。

第一节 鲁迅周围的人们

鲁迅跟广州新军阀的喽啰进行了一段针锋相对的交锋之后，首先冲出重围，和许广平一起乘轮船离开广州，于1927年10月3日抵达上海。

鲁迅抵沪的消息传开后，许多新老朋友纷纷前去造访。3日晚，林语堂和孙伏园、孙福熙兄弟去看望鲁迅，谈到深夜。10月8日，鲁迅和许广平定居闸北景云里，此后去看望和拜访先生的新老朋友更多。郁达夫曾设宴为先生洗尘。林语堂和孙伏园、昆仲再次前去造访，并愉快地和鲁迅夫妇合影留念。江绍原、赵景深、叶圣陶、胡愈之、樊仲云等文化界人士曾在章雪村欢迎鲁迅的宴会上高兴地同鲁迅相见。画家司徒乔、钱君匋、丰子恺曾先后去拜访先生。作家许钦文和画家陶元庆也常去鲁迅家小聚。革命互济会的负责人王望平，还有李伟森、柔石、冯雪峰、韩侍桁、马宁等进步青年作家也多次拜访过先生，柔石、冯雪峰后来还成为鲁迅最忠诚的学生和战友。鲁迅成为上海进步文化界的核心人物，受到人们尊崇。

搬到景云里第4天，鲁迅在三弟周建人陪同下去看望茅盾（沈雁冰）。茅盾是8月间从牯岭来到上海的，由于在武汉遭到当局通缉，因而深居简出，正静心从事《蚀》三部曲的创作。这是他们第二次相见，彼此谈得很多。茅盾由于遭到通缉，未便先去看望鲁迅深表歉意。接着谈了在武汉的经历以及

① 《中国现代史常识》（上册）224页、229页。

② 同上。

大革命的失败。鲁迅则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认为革命看来已处低潮，对仍在流行的革命不断高涨论难以理解。他表示今后不再教书，拟在上海定居下来；告知已在《小说月报》上读到《幻灭》，并询问茅盾未来的打算，茅盾表示正在考虑写第二部以大革命为题材的小说，今后准备长期蛰居地下，卖文为生。^①

许多高等学府纷纷前来邀请鲁迅演讲。他本着爱护青年的一贯作风，应邀去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演讲《关于知识阶级》、《伟人与化石》、《革命文学》等等，循循善诱、生动活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那哲人般的深邃思维和改革者的战斗呐喊震撼着一代学子的心灵，促进了他们思想的成长。

鲁迅组织朝华社，发行《朝华周刊》与《朝华旬刊》，介绍欧洲弱小民族国家刚健清新的文学和比亚兹莱、蕗谷虹儿的木刻版画；编辑《语丝》、《奔流》、《萌芽月刊》，发掘培养了白薇、杨骚、侍桁、柔石、张天翼、魏金枝、李守章、雪峰、白莽、王余杞、沈端先、陈正道、楼适夷、冯宪章、方之中、龚冰庐等一批青年作家。日后，许多团结在鲁迅周围的左翼作家，被文学史家称之为“《语丝》派”。

第二节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

比鲁迅稍晚，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郭沫若，从潮汕地区秘密回到上海，隐居虹口窦乐安路。知道鲁迅已来上海，且就居住在附近的景云里，郭沫若想到，应该联合鲁迅，共同进行新的战斗。他首先希望复活停刊已久的《创造周报》，作为攻击敌人的阵地。当时，作家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等创造社同仁也去看望他，彼此也有共同的想法。沫若请这3位朋友代他去和鲁迅先生商谈一次。1927年11月9日，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拜访鲁迅先生，传达了郭沫若的意愿。鲁迅欣然同意恢复《创造周报》，愿为它撰稿。12月3日，《时事新报》刊出了《〈创造周报〉优待定户》的广告，披露了这一信息，定于次年元旦问世的《创造月刊》1卷8期上，也决定登出《创造周报复活预告》，再次宣布鲁迅将成为它的特邀撰述员。

然而情况突变。

1927年末从日本归国加入创造社的成仿吾、冯乃超、彭康、李初梨、朱镜我、李铁声等人，都是中共党员，郭沫若称他们是“新锐的斗士”。作为党的文艺战士，自然最听党的话。这时他们听到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消息，读到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指出，中国目前的革命已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都是革命对象。这种谬误的理论迅速成为创造社“新锐斗士”们的武器。为了与党的决议相一致，他们在理论上，将过去较笼统的“革命文学”口号改为很明确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在策略上，决定不再联合鲁迅，而转变为批判鲁迅；在组织上，大家不同意恢复《创造周报》，而决定出版批判性、论战性的月刊《抗流》（后改名《文化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文艺创作。

郭沫若自己首先转变了过来，而且比他的同仁们表现得更积极，走得更远。

1928年元旦出版的《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发表了他的论文《英雄树》，鼓吹“无产阶级的文艺”或曰“倾向社会主义的文艺”；鼓吹“文艺界中应该产生出些暴徒出来才行了”。它还号召“脱去感伤主义的灰色衣裳，请来堂堂正正地走上理论斗争的战场。”这实际是向一切非“倾向社会主义的文艺”出击的动员令。

半个月后，《文化批判》创刊。创刊号登出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首先向非“倾向社会主义的文艺”开火：批判文学研究会作家叶圣陶，无理指责他“只描写个人和守旧的封建社会”，“是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他的笔尖只涂抹灰色的‘幻灭的悲哀’。”文章接着批判鲁迅，认为他仅仅“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是“隐遁主义”。而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与上述二人没有差别。”这些批判当然是错误的。文章对张资平的批判则是正确的。

2月15日该刊第2期又刊登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错误地把鲁迅指为小资产阶级“趣味”文学的代表，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相提并论。

后期创造社干将们的这些错误行为，自然会激起鲁迅的反感。3月12日《语丝》4卷11期发表鲁迅杂文《“醉眼”中的朦胧》，对创造社进行反批评，指出创造社的一些理论脱离中国实际，未免让人“有些朦胧”。鲁迅的反批评令创造社的“新锐斗士”们更为愤怒。4月15日《文化批判》第4号发表了一组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的文章：李初梨《请看中国的DonQuixote底乱舞》、冯乃超《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彭康《“除掉”鲁迅的“除掉”》以及读者来信等，谈论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对鲁迅进行了谩骂与人身攻击式的批评。

对创造社的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鲁迅是赞同的；对他们只强调文艺的战斗作用而对中国文坛缺少分析研究却又滥施棍棒极其反感。针对此，他发表了《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进行批评。

用极左观点、极左词语肆无忌惮攻击诬蔑鲁迅的，是郭沫若。他署名“杜荃”，发表在《创造月刊》2卷1期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发狂似的叫骂“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不得志的法西斯蒂！”

后期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当时是对的，但把鲁迅作为旧文学作家加以批判甚至诬蔑攻击，却完全错误。

第三节 太阳社及其他

1928年元旦，《太阳月刊》创刊，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也就形成了。《太阳月刊》的撰稿人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孟超、林伯修（杜国庠）、楼建南（适夷）、冯宪章、赵冷（王任叔）、戴平万、谷万川、殷夫、徐迅雷、刘一梦等自然也就是该社社员。太阳社刊物还有《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

太阳社也是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排头兵。但钱杏邨等个别人也和创造社一些人那样否定、批判鲁迅，误入了极左思潮的泥潭。

林伯修（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等的“我们社”和《我们月刊》，胡也频、丁玲的“《红黑》社”以及《现代小说》（叶灵凤编）、《无轨列车》（施蛰存等编）、《新文艺》（戴望舒、施蛰存等编）、《南国月刊》（田汉编）等，也都积极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此外还有一些小型文艺杂志如《洪荒》、《泰东月刊》、《戈壁》、《山雨》、《白露》等，也都属于《创造月刊》、《太阳月刊》的队列，做出了各自的努力，这些文艺社团的不少成员，后来也加入了左联。

第四节 繁荣的出版界

左联诞生前夜的上海出版界相当活跃，甚至可说多姿多彩。对左翼文学运动作过贡献的有创造社出版部、现代书局、光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励群书店、上海世纪书局、上海新宇宙书店、上海平凡书局、上海亚东图书馆、上海水沫书店、上海春潮书局、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南强书局、上海美丽书店、上海春秋书店、上海生路社、上海第一线书店、上海尚志书屋、上海远东图书公司、上海大东书局、上海大江书铺、上海华通书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上海春野书店、红黑出版社、